

何翠萍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鄭振滿與趙世瑜老師請我閱讀此專號文章，並提出一些交流想法。我是人類學者，研究專長一直是跨境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的「界域」(borderland)。我當下就很明白這幾位作者討論的帝國或地方社會，完全不是我熟悉的範疇。但因為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是我有興趣的領域，而《歷史人類學學刊》又是我很關注的刊物；加上兩位老師很客氣，不要求字數多寡，也不要求對所有文章皆着墨，我想大約不會太難，再怎麼捉襟見肘，應該也能夠寫出一些東西來，因此欣然答應。但是事實證明並不簡單。

不簡單的理由，並不是我不喜歡閱讀這個專號。事實上，這個專號的每篇論文都可圈可點，對於一個並不了解清帝國，更對新疆、蒙古研究完全沒有涉獵的我而言，增長了很多知識。不簡單，是因為需要提出一些可以交流的想法。什麼才是可以交流的想法？我們的研究視野和關懷彼此有交錯嗎？

從專號正標題來說，每篇論文都用新材料、新方法「重探」了清帝國與地方社會，有些論文比較着重前者，有些則是後者；但皆強調在呈現「帝國」與地方社會之間，層層疊疊的上下多重交錯效應所構成的歷史。尤其饒富興味的是「『華南研究』與『新清史』的對話」這個副標題。這一批年輕學者希望能夠打破一般被認為是「華南學派」或「新清史」研究學者在地域（京師、中原本土與「藩部」）、人群、制度或材料使用上的刻板印象，同時在這兩群學者之間「有意識的交流則相對缺乏」的狀況下，通過這個專號建立交流橋樑（頁3-4）。姑且不論這缺乏交流是否是事實，一群年輕有為的學者，感受到隔閡，而試圖在各自研究中，運用他們從這兩群前輩學者之所學，證實了「華南研究」或「新清史」學者的觀點、方法，名符其實地發揮了承先啟後的效能。真是太可喜可賀。問題是，我這個既不是「華南研究」，也不是「新清史」的學者，在這裡可以談什麼？

---

何翠萍，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臺北，電郵：tpho@gate.sinica.edu.tw。

大概只能試着從我們大家都關切的歷史人類學角度和我在中國西南部的研究心得交流幾個想法。

這個專號強調「利用多種不同的語言文獻，對傳統意義上的『漢文化地域』與『非漢文化地域』，『漢文化人群』與『非漢文化人群』，以交錯縱橫的多重視角」就各自所關切的問題做探討（頁4）。多篇文章相當清晰地討論他們各自對「新清史」與「華南研究」的看法。「新清史」比較偏向的「非漢」視角所帶來對族群面向的留意和「華南研究」相對偏向的「民間」視角所帶來對社會史和地方史的着重，是他們各自期待在文章中發揮的。

專號討論了清朝，這個非漢的「帝國」，如何用「中間人」，如何用海禁與保甲，劃定、治理他們東南的邊地，以及當地人如何應對、創造他們可為與不可為的局面（盧正恆的施琅家族研究，陳博翼的〈漳浦遷海考〉）；如何用八旗制度區分旗人和民人，在直隸鄉村圈充民地為莊園，土地與「民人」都為皇室、八旗貴族與官兵所有的狀態（邱源媛）；以及這個非漢的「帝國」如何通過宗教與法律籠絡離間他們最重要的盟友及藩屬——也是非漢的蒙古（孔令偉從蒙古僧人的禁限及懲處所做的討論）。同樣在這個漢與非漢的族群視角下，另外兩篇論文雖然也有非漢帝國的視角，但更重要的卻在呈現兩類主動或被動離散在國法之外的人群（蔡偉傑對流亡或經商、僱傭於蒙古的漢人及其「蒙古化」後人的討論，許臨君對出征於新疆、最後流落在新疆的湘軍戍卒及其後人的討論），如何通過非漢藩部與自己的宗教體制或信仰在非漢地域找到棲身之地。每個故事都說得精彩，讓我們明白了更多這些人群的歷史。

從「族群」視角來看，我們看到了非漢「帝國」相當突出的統治技藝（旗／民之分，漢、滿、蒙分治與蒙漢隔離等政策）及效應，看到宗教（或是蔡偉傑所說的「次官方權威」）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看到「非漢」的統治如何在中原本土施行時交錯運用當地既有機制的技藝，以及被統治、分派的漢人如何運用自己的傳統慣習來做應對、突破的生存之道。

但讓我們仔細考慮一下使用文獻的問題。專號文章能做到利用不同語言、性質的官方或民間文獻，是很大的突破。但在歷史人類學研究中，我們都知道檔案並不僅僅是資料的來源，而是一個呈現認識論的所在，我們更需要討論的是檔案的製造與檔案化的過程。因此，在統治技藝之外，任何非漢的普通人或一般社會的脈絡，在各個研究人群地域中如何發聲或發揮什麼作用是需要被呈現的。在非漢地域，如定湘王一文提出的「歷史主體世界觀」或「一般漢人傳統的領土觀和對神明的虔信」觀點非常精彩。但對因征戰而

留在新疆的湘軍及其後人，從定湘王崇拜發展為方神崇拜的過程，當地人民與社會脈絡卻談得相對有限。另外，漢人移民逃避於蒙古大沙畢中而成為蒙古人的論點，如果能有一些當地蒙古人，甚或只是來自大沙畢人的說法，不知道會增色多少？毫無疑問，此類一般人的族群視角深刻地影響地方社會歷史。

另一方面，僅從地方社會史的視角來看，儘管在這六個案例中，都是有文字傳統的人群，但除了定湘王一文外，其餘文章雖有訪問材料，卻很少運用到什麼傳說、神話或任何口傳形式的材料。而宗教方面的材料又都是訴諸某類文字，沒有薩滿、巫術，更沒有我們已經在多處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中看到的法術、乩童、靈媒，等等。從我比較熟悉的中國南方邊陲人群既有研究看來，它們反而是相當重要的表達地方歷史意識的方式。更不用說，儘管女性是這個非漢帝國最重要的「中間人」（如滿蒙之間，以及漢人移民成功轉為蒙古籍的案例），這整個專號六篇論文，卻一個女人的故事都沒有。

最後，一定要強調我對這個專號成果的喝採與珍惜。有這麼一批年輕人能夠替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架起這個「新清史」與「華南研究」的橋樑，並提供我們這麼精彩的歷史，是太可貴的一件事情。以上我所說的都是未來我認為可能突破的面向，不是批評。

（責任編輯：唐金英）